

殖民时期坦桑尼亚的印度裔移民群体探析*

陈金龙 杜英

内容提要 经过数世纪的经营,印度裔群体深深融入坦桑尼亚的民族大家庭,对坦桑尼亚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间和国内学界传统上将印度裔移民群体视为“中间人”,但是这种认识更多的是基于殖民时期的种族主义视角或者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民族主义视角。对印度裔群体内部进行分析发现,移民群体依照宗教派系和种姓原则,复制了印度本土复杂的社会构成,在东非大地上形成了一幅幅马赛克群像。多元化的印度裔群体,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为坦桑尼亚的社会变迁带来积极的影响,是坦桑尼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坦桑尼亚 印度裔 移民群体 穆斯林

今日坦桑尼亚的许多城市充溢着浓郁的印度风情,如达累斯萨拉姆市的印度人^①老街和学校,莫西市的印度教寺庙,散布于各大城市因医疗水平高而广受赞誉的阿迦汗(Aga Khan)医院,遍布城市各角落的印度裔经营的商店(duka),大学校园早餐桌上的油煎薄饼(Chapati)等。在19世纪中叶阿曼东非帝国时期,印度人就在坦桑尼亚留下各种印迹,东非沿海地区也是这样。这既显示了跨越印度洋的印度—东非区域贸易的历史联系,也反映出印度族裔深度融入坦桑尼亚社会的现实。

经过几个世纪的经营,定居的印度裔移民在坦桑尼亚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现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然而,印度裔群体在坦桑尼亚,乃至在东非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东非、南亚地区(印巴分治以前)、欧洲殖民国家的历史书写中被弱化了。国外学者,主要是南亚裔和南亚次大陆学者,因为东非国家独立后推行非洲化政策、地区性排斥印度人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更倾向于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角度研究东非印度裔,除探讨伊斯玛仪派穆斯林的博士论文和少数论著外,甚少从该国次级族群以及宗教派别的微观视角开展研究;国内相关研究更趋宏观,相关问题未尽深入,总体上以从印度裔的“中间人”身份出发展开论述。^②实际上,印度裔群体在定居后大体上复制了南亚次大陆的宗教文化社会特征,既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还有一部分锡克教徒、拜火教徒、天主教徒等,并且在这些不同宗教群体中,通常还有若干教派分支。印度裔普遍复制了种姓社会原则,因而从这一社会群体内部观察,不同分支群体之间的宗教文化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坦桑尼亚经济作物种植与社会变迁研究(19CSS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在本文语境中,印度人/印度裔不考虑印巴分治前后的变化,泛指来自印度次大陆的移民(引文特殊注明除外)。在东非历史文献中,常称其为“亚洲人”(Asians)或者“印度人”(Indians)。

② 国外有关研究在后文中多有引述,多偏重时代“热点”和宏观论述,有关伊斯玛仪派的文献以博士论文为主,后文多有征引,此处不再列举。国内有关研究包括杜英《印度与东非国家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周倩《肯尼亚的印度人》,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李鹏涛、车能《东非印度人的历史与现状》,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贺鉴、龚贤周《从“中间人”到“建设者”:非洲裔群体政治参与的历史透视》,载《世界民族》2022年第5期。以上文献从印度裔整体族群的影响和融入角度探讨了东非印度人的历史作用,但对这一群体的讨论未能进一步深入,对其他海外印度人的研究则更偏宏观。

景差异使其相互之间多有隔阂,往往难以合作。放到殖民时期的种族背景下,“白人”“印度人”“黑人”之间的壁垒层次分明,但这并非印度裔族群经营和生活的具体写照,也不能解释非洲国家独立后,“白人”走了“印度人”延续下来的族群及社会影响。概言之,“中间人”群体的定位,往往难以逃脱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视角或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民族主义视角,而从历史社会学的维度考察“印度人”有望更深入地挖掘这一群体在东非历史与现实中的紧密关联。本文以殖民时期的坦桑尼亚为背景,梳理印度裔群体定居、营商并逐步发展壮大的历程,初步考察主要的印度裔群体及其宗教文化概况,并对最有影响力教派分支略进行探微,进一步发掘印度裔群体对坦桑尼亚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历史影响,抛砖引玉,以期为深化非洲侨民群体研究提供绵薄之力。

一、历史上坦桑尼亚印度裔移民的定居与经营

在西方殖民入侵以前,东非、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已经建立起区域贸易网,印度人作为建立者之一,积极推动网络的联结。印度与坦桑尼亚之间的海上交往虽然有一些贸易产品和少量文献的证明,然而,目前难以呈现双方早期直接沟通的完整画面。

印度人同坦桑尼亚直接接触的最鲜明体现,就是东非沿海斯瓦希里文化中包含的显著的印度因素。一般认为,东非沿海的斯瓦希里人是由非洲班图人与外来的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融合而成的,斯瓦希里文化中相应地也含有印度文化的因素。^①得益于印度与阿拉伯半岛更为频繁的交往,这一时期的印度人通常是跟随势力更强大的阿拉伯人而来,在沿海城镇开展贸易。他们大多是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的穆斯林,总人数比较有限,并且人们往往随季风变换而迁移,并非正式定居。贸易的深入开展逐渐改变了这种现象。

(一) 东非贸易中印度裔商人影响渐增

象牙很早就是坦桑尼亚地区同外部世界贸易的重要产品。东非早期的商队用印度布匹、串珠等换取象牙,与大陆非洲人建立了地区贸易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19世纪,作为跟随者的印度人逐渐开始从经济上蚕食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在数百年间建立起来的地区优势。西方殖民者在入侵早期无法深入内陆,能同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在经济上展开竞争的只有印度人。印度人逐渐在事实上占据了柯巴脂和象牙贸易的主导权,并且资助阿拉伯人领导的商队开展活动。他们最初在印度有居所,慢慢地很多人逐渐定居东非。^②

大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桑给巴尔岛引入丁香,逐渐取代奴隶和象牙成为其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后,桑岛的丁香主要的出口地是印度、英国和美国,而印度孟买是最主要的出口港。由于废奴以及价格波动、奢侈消费带来债务危机等原因,丁香产业逐渐从阿拉伯人转移到印度人手中。到1888年,岛上大约2/3的丁香种植园被抵押给印度商人。^③

阿曼素丹在19世纪中叶迁都桑给巴尔,邀请印度移民到岛上定居,作为法庭助手、文员、商人和金融家,到1860年,桑给巴尔印度移民已经有大约5000人。^④吉万季家族的事业在东非地区最成功,其创建者卡利姆季·吉万季(Karimjee Jivanjee)于1819年抵达桑给巴尔。后来吉万季家族购买剑麻、椰子、咖啡种植园,开展多样化经营,涉及轧棉、制造油和肥皂、碾磨、销售和维修机动车

① 刘鸿武、暴明莹《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19页。

② R. W. Beachey, "The East African Ivory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8, no. 2 (1967), p. 278.

③ Peter J. Martin, "The Zanzibar Clove Industry", *Economic Botany*, vol. 45, no. 4 (Oct. - Dec.), 1991, p. 452.

④ Alia Paroo, *Aga Khan III and the British Empire: The Ismailis in Tanganyika, 1920 - 1957*,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Ph. D thesis, 2012, p. 37.

等行业,经济影响力甚至延续至今。^①此时从印度海岸到东非海岸的西北印度洋地区已多为英国控制,各种因素让印度与东非的贸易迅速增长,印度商人群体的增长也变得引人注目。1873年,前孟买总督弗雷尔(Bartle Frere)沿东非海岸巡游,此时他承担着终结该地区奴隶贸易的使命,弗雷尔致信伦敦的外交大臣,表达令自己感到震惊的发现:

所有的贸易都经过印度人之手,非洲人、阿拉伯人、欧洲人,都利用印度中间人或印度商人掌管具体的买卖,没有一名印度人的介入,无论是作为资本家或者小商人,什么生意都做不了。他们占领了每一处有贸易存在的地方。在桑给巴尔,他们已经掌管了海关管理的接近1000英里的海岸线。^②

这种描述不无夸张之处,尽管此时印度人可能掌控了主要的商路网络和贸易结点,但其人口数量仍是相对有限的。到19世纪末期,印度人对坦桑尼亚甚至东非沿海的经济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 殖民统治下印度裔移民扎根坦桑尼亚

德国殖民时期,在交通运输领域,坦桑尼亚社会经济面临从商队贸易到铁路运输、从单桅帆船到汽船的重要转变,这种变局深深地影响了印度人的经营活动。但是,铁路、汽船和新的殖民秩序并没有摧毁印度人群体的社会经济影响。德属东非的铁路建设开展得非常缓慢,中线铁路直到1914年才建设完成,对印度人掌控的商队贸易的侵蚀也是渐进的。单桅帆船曾是19世纪印度洋贸易体系的支柱,它们通常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拥有,汽船在19世纪末逐渐有取而代之的趋势。英国和德国支持的航运公司先后建立了印度与东非的汽船直航航线,1898年,达累斯萨拉姆和孟买两港之间的直航班次为每两周一班。^③由此可见印度人建立的同坦桑尼亚的贸易联系密切,在德国和英国分别控制下的坦桑尼亚大陆及桑给巴尔都是如此。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坦桑尼亚同印度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仍通过单桅帆船进行,但是汽船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仅如此,在船运、进出口贸易、关税征收和金融业等领域,印度商业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因殖民当局支持德国企业垄断而受到阻碍。尽管德国当局复制了英国在东非应用的印度法律,但印度人没有欧洲人那样的特权,并因其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受到德国定居者的厌恶,后者不仅将印度人视为商业竞争者,也害怕他们成为带来潜在危险的外国人。当局甚至在欧洲定居者的压力下,立法限定印度人用斯瓦希里语或一种欧洲语言登记账本,尽管柏林的国会没有通过该政策,但是反印度人的势力和限制印度移民的措施,让德国殖民时期的印度人对自身的地位和境遇感到不满。之后,坦桑尼亚大陆成为一战东非战场的主战场,就像马及马及起义时一样,当殖民势力离开后,当地非洲人往往摧毁印度人的集市,之后的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变动让印度商人遭受重大损失。

一战后,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人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善,定居的印度裔移民在政治地位上超越了阿拉伯人。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官方和同胞事业的推动和鼓励下,从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为主)到坦桑尼亚的移民数量大增。印度在英国殖民前后存在普遍的贫困现象,以及天灾和农作物歉收,也为增长的人口外流提供了一定的推力。殖民政府急需说英语的下属,英国当局从印度招募文官和工匠,尤其是被认为是可信赖和有效率的果阿人,他们作为出纳员、文员、勘察员、打

^① 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64. 经历数代人变迁,其部分家族成员建立的公司总部至今仍位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参见 Gijsbert Oonk, *Settled Strangers: Asian Business Elites in East Africa, 1800 - 200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3, p. 20.

^② Thomas R. Metcalf,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 - 1920*,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65.

^③ Martha Spencer Honey, *A History of Indian Merchant Capital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anganyika, 1840 - 1940*,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Ph. D thesis, 1982, pp. 142 - 143.

字员、伙夫等,在县级政治结构中供职,在治安方面则招募锡克教士兵。在委任统治体制下,印度人可以自由出入,这与南非的排斥政策相异。在坦桑尼亚独立前后,印度人向东非的自由迁徙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人口增长率非常高,来源地主要是古吉拉特邦和旁遮普邦。

表1 殖民时期坦桑尼亚的人口数量^①

年份	坦噶尼喀			桑给巴尔		
	总人口 (万人)	印度裔人口 (人)	欧洲裔人口 (人)	总人口 (人)	印度裔人口 (人)	欧洲裔人口 (人)
1887	-	1751	-	240000	3086	146
1901	-	3681	-	200000	7000	150
1913	406.3	9645	4744	197199	10000	234
1921	410.7	14991	2447	216790	12000	270
1931	502.3	32687	8217	235428	14000	278
1939	524.3	32801	7925	-	-	-
1948	733.2	59512	16045	246362	15812	308
1961	912.3	87300	22300	279935	18334	507

总之,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大体稳定,市政取得发展,本土生产亦有增长,从商的印度人群体繁盛起来,人口增长迅速。如表1所示,坦噶尼喀(坦桑尼亚大陆部分)的印度裔移民在一战前后的几个十年期里人口都是翻番增长的,桑给巴尔的人口相对起点高,有增长趋势在后期不显著。相比于本土黑人,坦桑尼亚的印度裔和欧洲人口的绝对数量仍是有限的,桑给巴尔的印度裔人口相对较多,但在独立前夕人口最多时也仅占6%左右;在坦噶尼喀,本土黑人人口从殖民初期的约300万,增长到独立前夕的900多万,与之相比,印度裔人口不到其1%。当然需要结合具体的时空维度去理解这些人口的变化及影响。首先,坦桑尼亚的领土面积超过90万平方公里,达累斯萨拉姆在20世纪中期一直是该国最大的城市,到1957年统计人口时,达累斯萨拉姆的人口为128742人,排名

^① 坦噶尼喀的“总人口”指本土黑人;殖民时期,尤其是德国殖民时期(1884—1914)并未开展全面人口统计,尤其是本土黑人人口,英国当局分别在1921年、1931年、1948年、1957年开展过人口统计,殖民报告中使用的统计数据,后续年份中常再作估算;欧洲人口较为精确,如1887年,桑给巴尔有90名英国人,35名法国人,12名德国人,9名美国人;印度裔人口精确度次之。英国殖民当局习惯以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分列。桑给巴尔在表格时间范围内属于英国保护国,其早期统计中,将果阿人单列,表格中算作印度裔,“总人口”指单列统计的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的本土黑人与阿拉伯人,其中1887—1913年的数据为主要城镇人口,不包括部分其他地区。Martha Spencer Honey, *A History of Indian Merchant Capital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anganyika, 1840-1940*,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Ph.D thesis, 1982, pp. 103, 122; C. J. Martin, “A Demographic Study of an Immigrant Community: The Indian Population of British East Africa”, *Population Studies*, vol. 6, no. 3 (Mar., 1953), p. 234; J. Scott Keltie (ed.),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888*, p. 787;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01*, p. 187;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14*, p. 187;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22*, p. 191; M. Epstein (ed.),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41*, p. 265; S. H. Steinberg (ed.),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51*, pp. 285-289;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61*, pp. 337-346,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第二的城市坦噶有 38053 人,排名第 15 位的城市布考巴仅有 5297 人,同期桑给巴尔城有 57923 人,^①在广阔的地域里,移民群体常在城镇中聚居,形成以特定宗教群体为主的社区,以便于其开展宗教或文化活动。无论是对欧洲人来说,还是对城镇中的本土黑人来说,印度裔群体的经营活动并没有淹没于优势人口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积极活跃地串联起当地经济生活的主要环节。其次,虽然人口总量有限,但印度裔群体在殖民时期特殊的经济结构中,整体上属于介乎“黑”“白”之间的“中间人”阶层,使其在殖民地经济中较易盈利的部门游刃有余,在中小商业领域甚至达到了近乎垄断的程度,例如在 1939 年,印度人从事坦桑尼亚大陆 50% 到 60% 的进出口贸易,提供 80% 的运输服务,占有 90% 的城镇财产和 17% 的非本土居民农业用地。^②因而,至少在经济领域,印度裔群体以相对较少的人口规模在殖民经济体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对东非影响深远的乌干达铁路建设以及相应的契约工体制,对坦桑尼亚尤其是大陆的影响远没有对邻国肯尼亚那样深,德国人修建铁路更多地依靠非洲本土人,运营时印度雇员也没有后来英国统治时那样的高比例。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坦桑尼亚的印度人更多的是非契约劳工后代,依赖委任统治体制下的自由流动进入坦桑尼亚,主要从事商业经营,部分从事建筑业、公共服务、私营交通业,少数从事农林渔等农业。因此,印度人形成如今在坦桑尼亚影响力源自长达数个世纪的开拓和经营。

二、马赛克群像:印度裔群体的构成

坦桑尼亚的印度裔是最早追随着阿拉伯人脚步而来的移民之一,尽管人数有限,但他们也参与了斯瓦希里文化的创建过程。随着印度与坦桑尼亚贸易的发展,以及跨印度洋轮船航线的开辟,亲属的经营基础和更好的经济前景、廉价的交通等因素构成了移民拉力。日益增加的经济机遇,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两地不断加强的贸易联系,使得坦桑尼亚所在的东非沿海成为一个合适的移居目的地,位于孟买西北以经商著称的古吉拉特邦、旁遮普邦等成为印度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印度裔群体逐渐形成了以亲属、乡邻聚居的社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集中于较大规模的城镇。这些移民复制了印度本土复杂的社会构成,在东非大地上形成了一幅幅马赛克群像。

(一) 殖民秩序中的“中间人”?

人们对于整个印度裔群体在殖民阶序中处于“中间人”阶层的印象根深蒂固,从殖民统治的角度看,这种殖民地种族体系的划分最为便捷,是殖民列强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早期的东非内陆商队贸易中,印度裔群体的少数成员从最初阿拉伯商人的追随者,逐渐以桑给巴尔和斯瓦希里海岸城镇为中心成为地区贸易的掌控者,其经营活动为东非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多为小商铺的店主,售卖外来的各种加工制品给本土黑人,有时甚至给黑人提供小额信贷,并收购他们剩余的农产品。此时的印度裔群体的经营者应被视作一种“中间商”,他们在经济上将东非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并不是后来深度参与殖民秩序的“中间人”。

在殖民时期,德、英当局的殖民力量在东非极为有限(见表 1),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生产经

^① *Tanganyika Under United Kingdom Administration: Report by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K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7,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58, p. 1; S. H. Steinberg (ed.),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6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61, p. 346.

^② “Report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on Tanganyika Territory 1939 by UK”, TNA Library, p. 262; Deborah Fahy Bryceson, *Food Insecurity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Tanzania, 1919 - 1985*, Hampshire: McMillan, 1990, p. 71.

营,当然也包括学校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基本运转,都需要借助“中间力量”,自始至终未曾认真考虑过直接依靠更广大的本土黑人;另外,作为英帝国臣民,印度裔群体早在殖民秩序建立之前就已开始在非洲扎根,在乌干达铁路修建和一战(东非是重要战场)之后,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殖民管理机构充当文员、军警,在铁路管理机构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但这些人绝对数量仍是有限的,群体主流仍是商人,也有工匠、教师、小种植园主等。因而,总体上印度裔群体延续了以前的经营基础,扩大经济和社会参与的范围,并在此过程中拓展群体的文化、政治影响,群体成员的社会参与并不以辅助殖民政权为能事,因此仅有少部分人被动地充当殖民政权的统治工具。

在殖民统治之下,当局通常将整个印度裔群体归入“亚洲人”“非本土人”以及“中间群体”等名目,以便利殖民体系的法律、行政管理,以这样的种族身份标识殖民政权中的经济、政治、空间边界。1918年,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欧洲殖民者公开发表的一份集会决议,反映了殖民当局的认知:

这些人(印度人——引用者注)代表东方的一种文明,与我们的文明相对,他们是介于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中间种族,同非洲人有更经常的接触……^①

正是从这种殖民-种族的视角出发,印度裔群体被赋予了“中间人”的身份。不过,他们也提到一个事实,即印度裔群体与非洲人更经常地进行日常接触,欧洲白人高高在上,在各个方面鄙视和贬低二者。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裔群体成员自己也在争取提升地位,政治诉求大体上经历了从次帝国主义到反殖民主义的转变,^②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不自觉地与非洲人站在同一个战线,因此,非常有限的基层政治参与,并未真正让印度裔群体成为殖民秩序的乖巧工具,这种“中间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大打折扣。

另外,在经济领域,印度裔群体并未拥有真正的特权,在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德国统治时期,他们与非洲人同样被认定为“土著”,但是没有占有土地的权利。一战中在为英帝国作出巨大贡献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仍有诸多限制,殖民当局动辄以“维护本土人利益”(坦噶尼喀名义上先后是英国委任统治、托管领地)为名,排斥印度裔群体的参与。印度裔群体的贸易企业或小商店是欧洲企业的有力竞争对手,成员的业务拓展依靠的是之前的经营基础和教派群体的资助,并未得到殖民当局的支持。

最后,印度裔群体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宗教群体之间极少合作,而且大多数的印度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中是排外和自我隔离的,基本上依据种姓原则实行群体内婚制,将南亚次大陆的社会与群体分化同样映照在了东非地区。用“中间人”的视角去考察印度教教徒社区、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斯玛仪社区、逊尼派穆斯林社区等具体的宗教社会群体,往往失之泛化,不能真正看清这些移民群体的具象。

总之,“中间人”的殖民-种族视角有形有象,但是仔细分析,它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殖民时期印度裔群体发展的历史社会进程,也“误解”了东非地区这一颇具影响力的群体的社会面貌。

(二) 殖民时期的主要印度裔群体构成

在印度裔群体内部,其日常生活和身份围绕宗教、种姓、语言的复杂原则进行分层,“社区”群体首先是宗教性的,这是经济与社会联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一些群体的社会表现才更真切,比如,印度裔什叶派穆斯林绝大多数是商人,逊尼派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多为工匠和店主。^③ 相比而言,印度裔穆斯林从事商贸经营的比印度教徒更多。

^① C. F. Andrews, *The Indian question in East Africa*, Nairobi: Swift Press, 1921, p. 18.

^② 李鹏涛、车能《东非印度人的历史与现状》,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

^③ James R. Brennan, *Taifa-Making Nations and Race in Urban Tanzani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9.

在殖民统治前期,部分零散的统计资料提供了有关印度裔群体的宗教概况:例如在1893年当时还是一个小镇的达累斯萨拉姆,在180名伊斯玛仪派印度裔穆斯林中,有172人是商人,在124名印度教徒中仅有35人是商人,其他人多从事手工业。^①如表1所示,1887年在大陆及桑给巴尔总计4837名印度裔中,有3075人属于霍贾群体(伊斯兰教什叶派一支,后来进一步分化),577人属于波哈拉群体(伊斯兰教什叶派一支),867人是印度教徒,79人是拜火教徒,120名逊尼派穆斯林(Memons),另有119人来自信德地区,教派不明确,此外,桑给巴尔还有超过700名果阿人未被计算在内。^②

桑给巴尔的第二任素丹出台鼓励移民的政策,邀请包括印度教徒在内的印度次大陆移民前往定居。到英国殖民时期,不同宗教派别的印度裔群体规模都扩大了。

表2 1957年人口统计中印度裔移民的宗教分布情况^③ (单位:人)

宗教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果阿人
基督教	886	15	4732
印度教	29035	3	10
伊斯兰教	30082	6272	9
耆那教	913	0	0
锡克教	4232	3	0
拜火教	170	0	0
犹太教	5	0	0
其他	11	0	0
未知	31	2	6
总计	65365	6295	4757

如表2所示^④,到殖民统治末期,坦桑尼亚大陆大部分印度裔移民是穆斯林(47%)和印度教徒(44.4%),其中来自巴基斯坦的人(他们在1947年前移居非洲)几乎都是穆斯林,来自果阿的人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虽然统计数据较为有限,但结合其他研究文献,仍能窥见殖民时期印度裔群体的一些社会文化特征。

在殖民时期,印度裔的主要群体有着大体相近的语言文化及来源区域。印度-雅利安语系的古吉拉特语和库奇语(Cutchi)是坦桑尼亚印度裔群体的主要语言,因为大多数人都来自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地区。印度西海岸地区被划分为许多土邦公国,以复杂的语言、宗教分割社区群体,他

① 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9.

② J. Scott Keltle (ed.),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Civilised World for the Year 1887*,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887, p. 783.

③ Laurent Nowik, "East African Indians: How Many Are They?", in Michel Adam (ed.), *Indian Africa-Minorities of Indian-Pakistani Origin in Eastern Africa*, Dar es Salaam: Mkuki na Nyota, 2015, p. 116.

④ 在坦桑尼亚独立以前的几次人口统计中,有关印度人群体及其教派分布的信息大多不明确,英国殖民时期多以欧洲人、亚洲人(或为印度人、果阿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等作为统计依据,大多不能反映印度裔群体的宗教、文化归属(种姓)状况。

们跨越大洋,离开拥挤且不稳定的家乡,在东非的广阔地域开拓了新的生计和机遇,建立了新社区,留下了形态迥异的寺庙,在很大程度上也重塑了群体自身的身份和宗教。^①

坦桑尼亚独立之前,印度裔群体的商业活动或经营,以亲属关系和种姓原则开展和传播,具有群体排外性。这种排外性并非指严格的行业垄断或者种姓专营(有的手工业如此,如鞋匠、裁缝),而是该种姓群体的经营活动只限于特定文化相近和语言相同的人,群体成员集聚资源,而不是从其他群体邀请合作者。种姓原则也决定了群体成员实行内婚制。移民而来的印度裔群体在殖民时期都自觉遵循这些印度社会普遍的原则,因而宗教派系与种姓原则结合,将看似整体的印度裔群体切割成一幅幅马赛克群像。

从整个东非范围看,人数最多、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印度教种姓群体是古吉拉特的帕泰尔(Patel)和库奇的洛哈纳(Lohona)。在印度教移民中,帕泰尔群体合作程度最高;独立初期,东非最富裕两个的家族来自洛哈纳,在东非大约有4万人,其中坦桑尼亚约有7000人;另外,在整个东非,群体凝聚力最强、人数最多、经济最成功的是伊斯玛仪派霍贾,但实际上该派穆斯林是近几个世纪从洛哈纳皈依伊斯兰教的。^②从结构上看,帕泰尔和洛哈纳两个群体非常相似。在东非,他们主要是商人,有少量的公务员,拥有最紧密的跨种姓联络,双方在社会生活和宗教仪式方面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是在东非三国中他们之间的跨种姓婚姻并不多。这是因为在印度的种姓排序中,帕泰尔略高,因而在少有的联姻中,都是帕泰尔男性迎娶洛哈纳女性。并且在古吉拉特的帕泰尔种姓群体中,还有两个内婚制的分支,其内部排序也有高低,甚至还可以继续划分几个分支,更小的单位是以“六个村庄”“十个村庄”这样的单位形成的村庄聚落,在这些聚落中实行村外婚制,再结合种姓群体内婚制原则,印度社会中复杂的社会文化传统可见一斑。^③当然,移民来到东非地区后,这一过程被迫简化,最初家乡的村庄和聚落限制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人们仍不自觉地遵守印度传统的同种姓阶层结亲的传统:男性可以不时迎娶略微低于其种姓地位的女性,但是女性则不可以。印度教徒多秉持素食主义,食肉是例外情况(这也是种姓判断“洁净”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有节俭与恪守传统的特征,对他们来说住房条件不算是财富的可靠指标,由此,因其较为简朴甚至糟糕的居住环境,他们时常成为欧洲人揶揄嘲讽的对象。

东非的耆那教徒同帕泰尔和洛哈纳群体在文化上接近,除了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外,没有人能够区分他们。在印度,大部分耆那教徒按照种姓规则属于商人,在拉贾斯坦和古吉拉特与拉贾斯坦交接的地方居住的耆那教徒,同其他商业种姓的印度教徒自由通婚,旁遮普印度教徒也有很多同相等层级种姓的锡克教徒通婚。但是,在古吉拉特地区,有两个耆那教群体最开始并不是属于商人阶层,其中一个出售牛奶,另一个务农,来到东非的耆那教群体正是这两派分支,而且他们都是耆那教另一种信仰分支的白衣派(对应另一支“天衣派”),这两个分支教派在宗教上是否有敬拜偶像之差,这进一步反映了古代宗教教义的分歧以及相应种姓的产生背景。耆那教徒群体高度集聚,拥有令其他群体羡慕的财富,东非的文化中心在蒙巴萨,他们的教区学校自办自营,运营良好,其他的群体组织也完善有序。^④

印度北部的旁遮普人占东非印度裔的1/10多一些。他们中人数最多、最有影响力的是锡克教徒,留着引人注目的大胡子,头上缠着包头巾,多充任殖民军警力量。在印度,这一地区的印度教

① Paul Younger, *New Homelands: Hindu Communities in Mauritius, Guyana, Trinidad, South Africa, Fiji, and East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25 - 226.

② Agehananda Bharati, *The Asians in East Africa: Jayhind and Uhuru*, Chicago: Nelson-Hall Company Publishers, 1972, pp. 51 - 53.

③ Agehananda Bharati, *The Asians in East Africa: Jayhind and Uhuru*, pp. 41 - 44.

④ Agehananda Bharati, *The Asians in East Africa: Jayhind and Uhuru*, pp. 60 - 63.

徒与锡克教徒并不容易区分,在很多地区两个宗教群体自由通婚,因为他们有相似的宗教仪式和实践。^①

此外,还有人数较少的小种姓,其印地语名称反映的就是职业,包括鞋匠(因接触动物毛皮,种姓排序较低)、裁缝、金匠,这在东非是赚钱的行当,比他们在印度时收益更高,并且由于种姓限制,高种姓的人即使再贫穷,也不会与其竞争。此外,殖民时期还有来自旁遮普的“不可接触者”,他们做清洁工,从事的是后来非洲人接管的与家政相关的卑微工作,后来这些人全都返回了印度。

果阿人是人数虽少但是地位显赫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初前往桑给巴尔充当厨师、商人和政府文员等,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信奉罗马天主教,母语属于南亚次大陆最南端的印度-雅利安语言,殖民时期东非的年轻果阿人不想被认定为印度人,通过只说英语来强化认同,并凸显与其他亚洲裔的不同。对他们来说,文化与政治认同是个大问题,果阿并入印度之后尤其如此。^②除了前文提到的果阿人,其他人数量不多,但有影响力的印度裔群体包括拜火教教徒、信奉佛教的僧加罗人等。拜火教教徒人数较少,但是在东非的城市地区分布很广,他们通常是富有的银行家、律师,有的成为精英学者。

印度裔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以喀奇县为主)和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因为总体人数过半,且较为集中,影响力大,故下文进行专题探讨。

(三) 穆斯林群体探微

如表2显示,坦桑尼亚大陆的穆斯林人数占优,与岛上的绝大多数居民一样,印度裔移民以穆斯林为主。这样,将大陆和桑岛合起来看,坦桑尼亚的印度裔中穆斯林群体人数明显居多。实际上,在印度裔群体扩大到这种规模之前,穆斯林较印度教徒更多地参与东非贸易,如表1中,1901年在大陆城镇的3681名印度裔移民中,2851人是穆斯林,625人是印度教徒,205人是果阿人。^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斯瓦希里海岸的伊斯兰特性更有利于开展经营活动,印度西北部也有更多的穆斯林商人在适应非洲大地后扎根。与此同时,印度教徒在当时多是临时经营,随时准备赚钱后返回家乡。

在南亚,绝大部分穆斯林属于逊尼派,但是在定居坦桑尼亚的印度裔穆斯林中,什叶派占多数,该派又可进一步细分成三个派别,尼扎尔伊斯玛仪派霍贾(Nizari Ismailis Khoja)人数最多,穆斯塔利伊斯玛仪派波哈拉(Mustali Ismailis Bohora)和十二伊玛目派霍贾(Ithna Asari Khoja)是另外两个较大的分支群体。^④

伊斯玛仪派本身是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的一支,并且在什叶派之中也不是主流,其在历史上的政治顶峰是建立了埃及的法蒂玛哈里发王朝。教派领袖经过数百年经营,在也门、伊朗、印度西部等地逐渐扎根并壮大。故而,印度的伊斯玛仪派比较特殊,因为他们的祖先最初是印度教徒,属于霍贾或者波哈拉种姓,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的这一派,因为传教领袖不同以及社区发展的差异,同时为躲避迫害而刻意隐藏教派身份,教派进一步分裂,他们主要集中在古吉拉特邦沿海的周边地区。对于到东非经营和定居,这些非主流的伊斯兰教派实际上也是在拓展本教派的影响范围,相对而言,印度教徒显然有更多的“故土”情结,从这个意义上看,东非的经历对于教派本身的发展与形塑具有重要意义。

① Agehananda Bharati, *The Asians in East Africa: Jayhind and Uhuru*, pp. 18, 22.

② Agehananda Bharati, *The Asians in East Africa: Jayhind and Uhuru*, p. 19.

③ Martha Spencer Honey, *A History of Indian Merchant Capital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anganyika, 1840-1940*, p. 123.

④ 在南亚的伊斯玛仪派中,尼扎尔和穆斯塔利分别代指霍贾和波哈拉两支(对应的两个印度种姓),前者因追随阿迦汗为现世伊玛目,也称“阿迦汗派”,后者也称达乌迪派。

在19世纪早期,尼扎尔伊斯玛仪派霍贾的宗教领袖,即伊玛目阿迦汗一世(1817—1881,阿迦汗为伊朗国王授予的头衔)在伊朗和阿富汗发展,在为英国人提供战略和军事支持的过程中得到后者的认可和扶持。在英国官方的认定下,霍贾身份从一个种姓变成了一个宗教标识,那些不追随阿迦汗的信徒转变为十二伊玛目派(甚至还有少数逊尼派),故该派有时也称阿迦汗派。在历史上,伊斯玛仪派群体主要的活动中心不断改变,相对而言对特定国家也缺乏归属感,这有助于培育一种迁移的精神。因此,该教派在南亚次大陆本身影响虽然较为有限,但经过数十年的经营与迁移后,这个逐渐壮大的群体却能在坦桑尼亚乃至东非地区建立起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印度裔穆斯林群体本身是多样化的,以什叶派为主的群体在坦桑尼亚的印度裔中人数众多,是因为殖民时期相对有利的移民环境吸引了大批教徒,建立起有影响力的集聚社区。在坦桑尼亚,伊斯玛仪派首先在桑给巴尔、巴加莫约、潘噶尼以及沿海其他地区定居,后来向内陆迁移,借助其他贸易中心最远抵达刚果和乌干达保护国,到1870年,坦桑尼亚共有2558名伊斯玛仪派印度人,其中近2100人在桑给巴尔。^①但是,该教派大规模进入坦桑尼亚是在20世纪上半期,在1900年的印度移民中,仅坦桑尼亚大陆就有3000多名伊斯玛仪派印度人。^②在整个殖民时期,伊斯玛仪派印度人是坦桑尼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争取印度人在坦桑尼亚的群体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南亚与东非政治事务上也发挥了影响力。

十二伊玛目派霍贾(Ithna Asari)与阿迦汗领导的伊斯玛仪派在教义方面非常接近,当然从他们同属霍贾种姓也可看到一些关联,而其生活方式却截然不同:阿迦汗派追求全面现代化,强调为了群体利益和信仰,可以“掩饰”传统的正统模式,因而教派的女性也可以接受教育。他们身着西方服饰,讲英语,比其他任何印度裔群体都更无保留地接受西化,不过其宗教集会大厅是排外的;十二伊玛目派霍贾被认为是所有群体中最保守的,他们强调纯粹的传统,反对女性受教育,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出版有专门的宣传期刊,刊名为《联盟》(Federation),内容用古吉拉特语书写,在编辑方面虽像现代杂志一样,但其内容是颂扬宗教正统价值,谴责年轻人的任性,批评他们饮酒、不参加祈祷仪式、接受非伊斯兰的思考方式等,批判最严厉的对象正是阿迦汗派,认为其偏离了信仰道路。^③处于两者中间的是波哈拉(又称“达乌迪派”),该群体结合了保守传统与面向现代性的因素,群体凝聚力很强,在经济上也很成功,有很多组织类似于阿迦汗派。

规模最小的是来自旁遮普的逊尼派穆斯林,其信仰体系与南亚次大陆相似,但是他们不被其他群体信任,受到正统穆斯林群体的指责。但这个人数不多、创建不足百年的小教派在非洲当地却受到尊敬,首先是其信仰虔诚,并不辞辛苦地传教,其次在所有的亚洲裔穆斯林群体中,只有他们深入非洲人中去传教,接纳非洲人入教,不过直到独立前,这个群体也很少与非洲本地人通婚,说明从印度社会带来的种姓传统仍是根深蒂固的。

殖民时期少有对不同教派的详细统计,但仍可以看出相对活跃的什叶派群体人数不断增加的趋势。结合之前的人口资料,有理由相信,群体规模的扩大是依照原有的社群基础成比例增长的。

根据1948年的统计,坦桑尼亚大陆上的印度移民总数为44248人,其中穆斯林有26020人,约占印度移民总人口的59%,而在穆斯林中伊斯玛仪派霍贾也占59%左右,官方的统计超过16000

^① Makrand Mehta, "Gujarati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East African Diaspora: Major Historical Trend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6, no. 20 (May 19-25, 2001), p. 173.

^② Alia Paroo, *Aga Khan III and the British Empire: The Ismailis in Tanganyika, 1920-1957*,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Ph. D thesis, 2012, p. 37.

^③ Agehananda Bharati, *The Asians in East Africa: Jayhind and Uhuru*, p. 84.

人,而据阿迦汗三世回忆,1952年其在坦噶尼喀的信众达到27000人。^①表1和表2中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独立前夕的60年代初,坦桑尼亚印度裔移民的总人数超过11万,大半是穆斯林。这一时期,印度裔族群中从事批发零售贸易的人占总人数的50.1%,14.2%从事制造业,13%担任公职;果阿人中担任公职的人占其总人数的35.2%,19.3%从事制造业,17.7%从事批发零售贸易。^②

在殖民时期的坦桑尼亚大陆,虽然印度的种姓制度传统受到一定挑战,不同的印度裔群体很大程度上仍以种姓原则和内婚制开展社会生活。^③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亚洲人群体,无论是伊斯兰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当然也包括印度教徒,群体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群体内婚以及人口迁入,极少同当地非洲人结婚。伊斯玛仪派在印度裔群体中最开放,但到独立时期,跨种族的婚姻仅限于教派成员迎娶欧洲裔女性,各教派成员同非洲本土人正式的结合案例稀少,尽管有很多非正式的两性关系以及亚非混血后代出生,但他们并未获得种姓群体的认可。印巴分治、非洲国家的独立最终迫使印度裔群体走向妥协或者离开。

在坦桑尼亚,不同穆斯林群体的领导权一直难以统一,不同教派在伊斯兰法律教育、宗教机构和仪式、世俗事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分化。伊斯兰文化是当地斯瓦希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本土人接受的伊斯兰教多属于逊尼派,而侨居的印度裔穆斯林多属于什叶派,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虽然都属于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但其群体认同的领袖又不一样。英国殖民政府在城市的种族分区政策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加剧了这种分歧。^④坦桑尼亚的穆斯林群体在移民之前就已经有较明显的教派分化,在殖民秩序下,各教派相对独立的社区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化状态。

无论如何,在殖民时期及独立以后,包括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果阿天主教徒,以及不同穆斯林群体在内的印度裔移民群体共同为坦桑尼亚的社会历史发展带来了显著的影响。

三、印度裔群体对坦桑尼亚历史的影响

(一) 斯瓦希里文化因子与社会变迁

印度裔群体以印度洋贸易者的身份参与构建坦桑尼亚斯瓦希里海岸的多元区域文化,让斯瓦希里文化中融入了印度文化的因子。相比而言,其中“印度的”文化因素似乎要弱于伊斯兰文化的因素,尤其是这些富裕的穆斯林群体日渐强调其宗教属性,而非种姓和文化身份的属性。随着东非印度洋沿岸的伊斯兰色彩逐渐加强,很多根植于血液中的印度次大陆文化因素很难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逐一捡拾出来。但是,人们很容易发现遍布在坦桑尼亚大城市的宗教建筑、饮食、贸易方式、服饰、语言(古吉拉特语、印地语)等方面的印度或南亚次大陆的伊斯兰风格,比如桑给巴尔斯瓦希里什叶派挽歌以及圣礼中使用的斯瓦希里美食,都是印度式伊斯兰文化仪式与非洲本土

^① 在整个殖民时期,能反映伊斯兰教的教派分支统计人数的资料极少,参见 Alia Paroo, *Aga Khan III and the British Empire: The Ismailis in Tanganyika, 1920-1957*,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Ph. D thesis, 2012, pp. 76, 80; W. Somerset Maugham, *The Memoirs of Aga Khan: World Enough and Time*,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54, p. 167; J. P. Moffett (ed.), *Handbook of Tanganyika* (Second edition), Dar es Salaam: The Government Printer, 1958, p. 301.

^② 此处统计为14岁以上有收入人数(儿童和女性通常不包含在内),果阿人从印度裔中拿出单列,参见 J. P. Moffett (ed.), *Handbook of Tanganyika* (Second edition), p. 301.

^③ Robert J. Boccock, "The Ismailis in Tanzania: A Weberian Analysi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2, no. 4 (Dec., 1971), p. 367.

^④ Holger Bernt Hansen and Michael Twaddle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ast Africa*, Dar es Salaam: Nkuku na Nyota Publishers, 1995, p. 25.

文化长期融合的具体体现。^①早期印度人的小商店沿主要交通线路或商路设立,逐渐延伸到人口集中的农村聚落或者小城镇。他们用晒干的砖头和波纹状铁皮屋顶修建房屋,这在当时区别于本土的建筑风格,现如今成为当地小城镇建筑的流行样式。总的来看,多元化的印度裔群体同阿拉伯人一道,推动了沿海斯瓦希里文明的发展。

另外,伊斯兰教育是整个东非地区文字教育的先驱,早于基督教会的学校教育,后来人数渐增的各印度裔群体对坦桑尼亚教育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伊斯玛仪派建立的学校影响力巨大,惠及其他印度人群体以及少部分本土非洲人,时至今日,以阿迦汗命名的学校和医院等仍代表坦桑尼亚相关领域的顶尖水准,其设施与技术水平在普通民众中同样享有口碑。坦桑尼亚独立迄今已久,但仍能感受得到印度裔在该国教育、卫生等领域引领的社会变迁。

(二)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不同的印度裔宗教群体是早期斯瓦希里海岸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对坦桑尼亚乃至东非海岸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小商店(杜卡)是印度人在坦桑尼亚的一种历史标识,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获取货物,面向市场,能利用借贷和其他商业技巧,掌握当地人没有的信息,因此在殖民时代印度人店主常将阿拉伯人和非洲竞争者排挤掉。从最初参与构建斯瓦希里海岸商业的商业资本阶层,到逐渐从属于欧洲资本的中间阶层,从商业领域到生产领域,印度裔通过多样化的经营活动推动了坦桑尼亚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在后来的英国殖民统治下,邮局、银行、法庭等都有显著地模仿英属印度模式的痕迹,这显然便利和拓展了印度人的经营活动。印度裔群体在金融、卫生等领域的先锋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其金融资本对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到20世纪50年代初,坦噶尼喀有5个信贷合作社都是伊斯玛仪派建立起来的。^②

印度裔群体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坦桑尼亚沿海城镇的发展。巴加莫约和达累斯萨拉姆两个城市在20世纪的历史地位变迁是最显著的例证,巴加莫约在印度裔商人的控制下,在19世纪末掌控了面向大陆的商队贸易;德、英统治者历经半个世纪的努力才确立了达累斯萨拉姆的城市地位与影响力。^③20世纪初,德属东非中央铁路的建设吸引了大量印度人,其中有1/4的参与者在达累斯萨拉姆定居,以宗教社区存在的印度裔群体成为该城市日益发展的主力军之一。其他城镇与之类似,印度裔群体以宗教场所为核心聚居社区,进而拓展建设学校、医院,以及其他社区活动场所,成为不少沿海市镇继续扩大规模的基础。在殖民当局以种族空间为基础对达累斯萨拉姆市进行分区规划时,印度裔的经营活动冲破了空间局限,在很多情况下以租金形式回馈非洲本土房主,冲击了殖民城市规划,有力地推动了该市的快速发展。^④

(三) 政治觉醒与殖民抗争

印度裔为争取群体利益建立起团体组织,其创建也推动了非洲人的政治团结。后来这些团体与非洲人一道同殖民政权展开斗争,助力于坦桑尼亚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反殖斗争,在坦桑尼亚走向独立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其中,词汇影响主要反映了商品贸易特色,参见 John M. Mugane, *The Story of Swahili*,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50-51; Iqbal Akhtar, *The Khoja of Tanzania: Discontinuities of a Postcolonial Religious Identit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6, p. 25.

^② R. S. W. Malcolm, *Report 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for the Year 1951*, Moshi: KNCU Printing Press, 1952, p. 8.

^③ Steven Fabian, "Curing the Cancer of the Colony: Bagamoyo, Dar es Salaam, and Socioeconomic Struggle in German East Afr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0, no. 3 (2007), pp. 468-469.

^④ James R. Brennan, Andrew Burton & Yusuf Lawi, *Dar es Salaam-Histories from an Emerging African Metropolis*, Nkuku na Nyota Publishers, 2007, pp. 119-125.

一战后,不同城市的印度裔群体成立了印度人协会,要求印度人取得单独的法律地位,虽然未能取得成功,其整个群体的影响力显著上升。1923年,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同在坦噶尼喀发起停业罢工(Hartal),为期54天,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效果。^①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刺激了非洲人的觉醒,另外,无论是参加一战的非洲士兵,还是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并填充殖民政权较低岗位的非洲本土公职人员或教师,都从印度人的行动中受到激励,其中不乏对印度人所占地位的嫉妒和憎恨,发展成为坦桑尼亚现代政治的先驱。继肯尼亚之后,坦桑尼亚成立了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职服务协会(TTACSA),成为该国现代本土政治组织的滥觞,后来其他的政治团体相继成立并领导非洲人同殖民政权展开斗争。

在西方殖民之前,印度人主要靠维持与斯瓦希里或阿拉伯统治者的关系来维护其经济利益,对政治的兴趣不高。欧洲殖民时期,他们最初的主要政治目标是获得比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更高的法律地位。伊斯玛仪派伊玛目阿迦汗三世甚至在一战结束之际全力支持将坦桑尼亚大陆作为“印度人的殖民地”,并为此展开政治斗争,尽管最终国联以英国委任统治作为最终的裁定,但这种提议一时将英国、印度、坦桑尼亚的不同群体卷入了争论旋涡,^②不仅强化了印度裔族群的分歧,也进一步增强了本土非洲人对印度裔群体的猜疑甚至憎恨。随着英帝国的解体、印巴分治以及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选择留下继续经营的印度人转向支持非洲民族主义事业,在从“多种族”宪制最终走向独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当然,在殖民统治之下,“印度裔”是这个“中间人”群体团结的地缘纽带,它也确实帮助印度裔群体争取到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以宗教、种姓为基础的社群才是印度裔群体中信贷、庇护、社会福利等的主要提供者,很多时候甚至“穆斯林”这一范畴都愈来愈无法真正地体现不同派别穆斯林群体的行动和态度,泛化的群体划分掩盖了不同派别间的龃龉不合。因此,这种宗教派别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印度裔群体在坦桑尼亚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团结合作。

四、结 语

东非印度裔商人凭借印度洋季风贸易,成为东非斯瓦希里海岸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贸易商品有象牙、丁香等,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持续,印度裔逐步定居并扎根在坦桑尼亚等东非沿岸地区。在德、英殖民统治时期,东非印度裔群体成为欧洲人和非洲人种族之间的“中间人”,拥有强大而持续的经济影响力。印度裔群体在坦桑尼亚定居和经营商业的过程中,既保留了南亚次大陆宗教族群的独特性,也融入东非当地的斯瓦希里文明特色,更因超强的商业能力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其中以信仰印度教的帕泰尔群体、洛哈纳群体,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迦汗派群体、达乌迪派群体等最为成功,是其他印度裔以及非洲本土人羡慕与嫉妒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欧洲人殖民统治秩序建立之前,印度裔就已经打下了经营基础,印度裔群体所谓的“中间人”角色更多的是殖民者新加入的种族分层结构的结果,对作为主体参与者的印度裔本身而言,他们只是在延续贸易商人或小商铺店主的身分。这与后来有一部分来自不同群体的印度裔参与殖民秩序并由此获得利益并不矛盾,印度裔群体在殖民时期虽然对提升政治地位(如追求与欧洲人平等,或者被视作“英国臣民”)的追求愈发强烈,但在整体上并未如愿。

坦桑尼亚的印度裔群体映照了南亚次大陆印度宗教、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不同群体之间有显著

① John Il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65.

② The Aga Khan, *India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Evolution*, London: Philip Lee Warner, 1918, p. 128.

③ 李鹏涛、车能《东非印度人的历史与现状》,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

的排他性,按照种姓原则严格实施内婚制,鲜有跨种姓、跨教派的通婚案例(甚至有时从印度引入新娘以满足传统婚配要求),也同本土非洲人保持社会距离,即使有亚非混血的后代往往也得不到正式认可。当然,两个群体整体上同时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歧视。由此,在殖民时期,“排外”的印度裔群体既未从殖民当局获得实际支持,也深深伤害了非洲本土人的民族情感。独立后的坦桑尼亚政府立即着手移除欧洲人这座大山,对印度人也心怀愤恨,只是当时无奈于留下的印度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在富有个人领导魅力的尼雷尔治下,很大一部分印度裔留下来继续经营,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在非洲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做妥协,迎面新的挑战。

一方面,殖民时期的印度裔群体在坦桑尼亚发展壮大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留下了丰富多元的遗产,他们在贸易、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成就卓著,在引领示范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坦桑尼亚乃至东非的移民定居经历,对这些在南亚次大陆的边缘群体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总而言之,在殖民时期,印度裔群体定居坦桑尼亚,近看是马赛克群像,远观则构成以宗教派系分割、以种姓职业化为底色的社会整体,加强了坦桑尼亚内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推动了坦桑尼亚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影响了坦桑尼亚,是坦桑尼亚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bstract After centuries of operation and survival, the Indian community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family of Tanzania, and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ourse of Tanzani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Indian diaspora used to be viewed as "intermediaries" by local and Chinese scholars, but this perception is more based on a racist perspective of colonial times or a nationalist perspective of African countries after independence. A peek inside the Indian diaspora shows that these immigrants have duplicated the complex social composition of India, their original homel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religious sects and castes, thus forming a mosaic of sub-groups across East Africa. The diverse Indian community has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social changes in Tanzania in terms of social culture,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anzania.

(陈金龙,讲师,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舟山,316000;杜英,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芜湖,241002)

(责任编辑:于红)